



善恶抉择



马基雅维里
政治道德思想研究

谢惠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伦理学视阈中的不正当行政行为问题研究”（10CZX038）的阶段性成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985项目资助

谢惠媛 著

善恶抉择

马基雅维里
政治道德思想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善恶抉择: 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思想研究 / 谢惠媛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9

(未名中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301-19203-0

I. ①善… II. ①谢… III. ①马基雅维里, N. (1469 ~ 1527) — 政治思想 — 研究
IV. ① D095.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9202 号

书 名: 善恶抉择: 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思想研究

著作责任者: 谢惠媛 著

责任编辑: 黄敏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203-0/B · 099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310 千字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政治与道德的吊诡

万俊人

如果把正反交互及其无穷的辩难看作古希腊原初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之本义，那么，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便可以看作一种充满吊诡的辩证关系。如果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所谓“阳儒阴法”多少能够显露政治与道德之间的这种辩证式的吊诡奥秘，那么，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伦理主张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把玩“阴”谋、并鼓吹用“阴”谋制胜“阳”谋的政治“恶”论。无论人们或者马基雅维里本人可能提供多少或者多么充足的历史语境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辩护，其以阴罚阳的政治“恶”论都足以让人们瞠目结舌，惊讶不已。我相信，正由于此，马基雅维里本人及其政治道德思想才会成为近代以来人们津津乐道、聚讼不断的思想话题。

门下巾幖谢惠媛挥笔参乎陈言，欲给这一思想话题增添一笔。我不知道其言其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反响，但她刻苦而出色的研究使我不得不确信，无论其言其论反响如何，她的参言或多或少会有投石平湖、甚或久弗平静的效应。这是一定的！我这样自信，倒不是因为她的言论有多大多重的分量，而是——或者更确切地说，更多的是——因为此思想话题本身就是一个是非之地，既若空谷，即便是稍微涉足，便会足音远应；又如烈焰干柴，哪怕是轻微摩擦，也会燬火燎然。

对于这样一个是非颇多而我又惮于触及的话题说三道四，老实说，我是有所顾虑的。但惠媛君反复促我为其新著一序，坚辞不能且不当，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借题发挥一番，且为序罢。

一 阴阳两界真与假

直观而论，马基雅维里受人关注和诟病的主要关节似乎是其非道德主义的政治权术学。可实际上问题远比这种直观论断复杂得多。比如，马基雅维里明明是固执于一种非道德主义的政治学立场，为何后人仍然把他视之为西方近代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先行者？这显然并不符合诸如施特劳斯等所理解的正派的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义理。又比如，早在古罗马时期，律法主义者便看出并提出了政治优先并高于道德的类似主张，为何后人仍然把他看作西方古典政治传统转向西方现代性政治哲学的关键人物？即便我们承认道德与政治的分离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标示了西方现代性政治和政治哲学的转型特征，也似乎不宜把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简单地等同于“把恺撒的归于恺撒，把耶稣的归于耶稣”之政治说辞。最后还比如，单单就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脏手”观念而论，虽然其非道德主义意向不难证明，但承认政治之手的“脏”不也还是对政治道德之真实存在的一种反证么？是否可以将其简单地归于非道德主义范畴而心安理得呢？恐怕不能如此武断罢？！凡此种种，都显露出一种强烈的暗示：马基雅维里及其政治道德学说并不简单，其所留下的疑问和政治思想价值都十分耐人寻味，需要我们耐心谨慎地考究分析。更为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分

析，很可能还会让我们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哲学形成许多新的有意味的思考，产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思想效应。

与多数同类著述不同，谢著对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学说的检视所采取的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政治伦理的视角，这使其分析论述有了一种哲学的理论高度。谢著告诉我们，马基雅维里及其政治道德学说的提出本身，构成了西方古典与现代社会转折关节的一个重大学术事件，提出了一个关乎古今政治和道德之间价值翻转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现实政治与理想道德的根本价值立场问题。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政治的世界根本只是一个现实的世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功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重视和追求的只有成功、优胜和闪耀在皇冠顶上的强权的光芒。因此，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或者，一切关乎政治的学说和理论——所应且所能关注的只能是“事实之真”，甚至很可能还只是成功行动的“事实之真”，而非一般哲学所关注的“哲学真理”亦即“绝对真理”，或“知识之真”、“观念之真”，当然更不会是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所关注的“价值之善”甚或是所谓道德“至善”。由于，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要害只在“真实”而非“真理”，所以，它（们）所应且所能做的事情也只是去弄清楚诸如“实际如何？”一类的事实问题，而大可不必奢望去考究“应该如何？”一类的道德价值问题。

的确，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探究的是“意义的世界”，更确切地说，是“理想的世界”，因为它们总是情不自禁地一头走到黑，去追究绝对真理，拷问完善，无论它们从什么地方出发，归宿似乎是注定的：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伦理学和伦理学家似乎都是那位不知疲倦的西西弗斯，在不断的挫败中不断地发起对顶峰目标的冲击。这种对真理和至善或完善的执著是如此顽强而坚定，真理与至善又是如此遥不可及，以至于进至现代，就连许多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也产生了一种思想的恐惧，开始“拒绝形而上学”，并惮言“本体论”的话题。可是，政治不是单纯的思想游戏，而是真真切切的行动游戏、权力游戏，一切政治事件或事态都呈现在眼前当下，而且常常还是具有某种紧迫感的、事关重大乃至生死攸关的事态和事件，不仅要求坚决的行动，有时还要求政治人必须采取果敢的决断和重大坚决的行动。不独如此，哲学和伦理学所关注的“意义的世界”总是靠

某种形式的“目的”甚至是“终极目的”支撑起来的，目的支撑意义，并形成由某种原则或原理所构成的观念体系，从而自我编织成一个巨大的观念思想的蚕茧，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因之便习惯于安卧在这个观念思想的蚕茧内无以突破。在此意义上说，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是行动的或实践的，而哲学和伦理学则是原则的或理论的。诚然，后者的确是一个温暖祥和的目的论王国，有着深厚坚硬的原则或原则的“茧壳”，可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世界却是一个嘈杂喧嚣、乃至充斥着强健肌肉和凶猛搏击的经验世界，要想在这个世界里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政治生活的不易在于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常常有着超出“原则或原理”、以生命之躯抗击“必然”和“命运”的特别要求。而这又深刻地警示着人们，尤其是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们，在政治生活的世界，必然与偶然、命运与幸运、机会或运气、行动与果敢、意志与毅力等具有政治德行的因素又有多么重要！所有这些都是所谓的哲学原理和道德伦理原则所无法解释的，更甭说解决了。

政治的或行动的世界与哲学/伦理的或意义的世界哪一个更为真实？进而更极端一些地问，上述两个世界究竟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最后也是最极端地问，人类社会生活世界究竟是否还存在真假？马基雅维里好像是没有这样明目张胆地发问，可他对政治与道德之间的近乎血淋淋的分割却一次又一次地让人们禁不住这样发问。在中国远古屈子的《离骚》中，人们应该不难听出这样的拷问；甚至于通过清末崇祯皇帝自缢枯树的行动，人们也不难想象到这类拷问。我想，崇祯的自缢行动一定是绝望的，而且肯定是面对苍穹天命的绝望！

二 阴阳两手硬与软

然而，马基雅维里的用意不在引发人们的问题意识，而在激发人们的政治行动。行动的问题不是原则或原理的问题，而是行为技术的问题，对于政治行动而言，关键是政治权术及其有效运用的问题。

在马基雅维里眼里，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成功或者优胜属于强权。职

是之故，探究和寻求有效运用政治权力并使之尽可能变得强大有力的基本方法，亦即探究一种功利主义的或曰高效能的政治权术学，便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根本任务。对此一主张及其隐秘意图，谢惠媛博士可谓是心领神会，她通过仔细分梳马基雅维里对 *virtù*、*fortuna*、*necessita* 和 *politica* 诸关键词的定义和解释，揭示了其政治学说为何如此注重政治行动和政治行为技术（即所谓“政治权术”）的内在因由。

从某种不可明言的意义上说，政治几乎是专属男性的行动游戏。当代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忠实的施特劳斯主义者曼德菲尔（Harvey C. Mansfield）关于“男性的气概”之专门研究，以及他关于马基雅维里“德性”（*virtue*）的研究似乎是对这一论断的最好注释，尽管另一位当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纽丝鲍姆（Martha C. Nussbaum）对曼斯菲尔德的“男性”哲学做出了极为愤怒的反驳和辛辣的讽刺。马基雅维里自然谙熟 *virtù* 一词的“男子”或“男子气”词根本意，也忠实于这一语词所含的“果敢”、“勇猛”、“力量”等词源学内涵，只不过他的醉翁之意大多集中于政治行动的“男性”游戏特征，这就是果敢决断、大胆行动、无畏而行、有谋而动的政治行动特征。政治行动的这一特征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必然形成的，或者用今天的网络用语来说是“被形成的”。这是因为，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充满着 *fortuna*（运气），政治中的运气或幸运既如空穴来风不可捉摸，又似天命降身难以摆脱。这或许最切近政治生活中 *necessita*（必然）一词的意味，只是政治家们对“必然”的解释与哲学家们的殊然有别：后者常常将之嵌入严格的因果链中，使之具有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定力；而前者却将之置于鲜活的政治动态中，赋予它不止一种的不得不如此这般的动力。“天降大任于斯人”是政治生活世界里最生动的 *necessita* 证明，偶然而必然，必然而偶然，这才是政治天命的真谛所在。因此，如何看待并“生”“活”于政治（*politica*）之中，如同滔海捕捞者如何看待大海和生息于滔滔波浪下的芸芸众生一般。汹涌、颠簸、深不可测甚至弱肉强食都不可避免，所有生命和行动的唯一理由或动力只能是随遇而“生”，迎难而“活”，伺机而“行”，权变而“动”。

政治的生活世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随时随地都可能扼住我

们生命的咽喉。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尤其是我们中间的那些较为积极活跃的政治人，都必须学会用另一只更为强有力的手扼住这只“看不见的手”，如此才可能真正扼住我们自己的命运咽喉。政治权术学就是让我们能够拥有“一只更为强有力的手”的有效法门。关于“政治权术学”，马基雅维里不是历史上最早的发明者，但肯定是历史上最大胆、最直率的政治倡导者，甚或也称得上是一位少有的政治权术天才。如何筹划阴谋并有效实施之？如何获取、维护政治权力并最大限度地使权力权威化？以及，如何驯化君主、驾驭群臣、掌管军事、组织动员社会、获得权力晋升……？还有，如何巧言令色而免于猜忌责备？如何趋利避害、化害为利并化小利为大利？如何克敌制胜？一言以蔽之，如何以阴克阳、以阳滋阴？都是政治权术学的经义之所在。能否安全和有效且高效地把玩阴阳两手，乃是检验政治人或政治家成败得失的现实尺度。马基雅维里如是说，也如是坚信。对于长期浸淫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中国政治人来说，马基雅维里的这套权术学大概并不陌生，回味一下我们的政治先辈们所谓的“威猛相济”、“阳儒阴法”之类，读一读古代的《韩非子》和当代的《厚黑学》，再检视一下历代宫廷政治的权力更迭和权力转换，乃至现代“文革政治”的那些惊心动魄的风云画卷，我们一定深有感触和体会，即便我们的体会还不如那些弄臣、奸臣，乃至后宫的娘娘们。

三 阳奉阴违德与得

诚然，马基雅维里并没有全然遗忘政治背后的道德，更清楚政治行动主体——政治家和所有社会的政治人，比如政治公民——在政治生活世界里采取行动和把玩权术的道德风险。他也知道，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政治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进而把政治与道德本身分离开来是一回事，从人类思想和价值评价上能否将这两个方面全然分割开来却是另一码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传统也讲权术权威，也知道政治与道德之间的某些差异，但政治的“道”、“术”、“势”三者之间总是相辅相成的，有时也会纠结得难解难分。一个最为明显的事实是，政治人物也就是那些当权者们无论怎样都难以逃

脱现时代和将来世代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臧否，因此也都或多或少地担心自家身后的名声和名誉。乍看去，政治只是政治家们的权力游戏，但历史实际上终究是由人民书写的。千秋功罪，自由（有）后人评说。于是，人们发现，在人类政治生活世界的背后或其中，仿佛还有两只永远无法逃脱的“可见之手”：一只是道德伦理的，一只是历史的。在西方，很可能还有第三只更隐秘的手，那便是宗教神学的无形圣手。

对于所有的政治家或当权者们来说，这三只手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如来之手”的意味，不可不顾，不可不惧。毕竟，死后仍让后人指指戳戳，甚至让后人掘墓鞭尸，总归不是一件好事。在这三者中间，道德伦理之手虽然看起来最少受人敬畏——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政坛，但实际上却是最为阳光、最为常见的，或者更确切些说，对于当权的政治人物而言，道德之手是最具纠缠力和日常约束性的，它与政治家及其行动如影随形，甚至寸步不离，政治社会及其公民也最经常、最善于运用这只阳光之手来拿捏政治当权者们的权力行为，用它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表达“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政治伦理判断。

可见，在政治与道德之间，“剪不断，理还乱”才是常态和恒理。既然如此，无论你取何种立场或视角，都不得不对此有所关注，有所表态。马基雅维里对此心知肚明，但他采取的态度和立场却不是迁就，更不是服膺道德和历史的价值评价，而是一种非道德、非历史的反抗，一种近似于明知故犯的政治权术论和政治功利主义效果论，其“政治脏手”（dirty hands in politics）的观念和主张再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他的这一有些令人惊异的极端政治学立场。

马基雅维里坦诚地告诉政治家和当权者，如何摄取、掌握和扩张权力是政治家们的毕生功课，但一旦权力在手，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就是最紧迫、最关键、最显示才干和胆量的事情，因为在这一关口最能展示当权者的政治智慧，尤其是玩弄政治权术的政治艺术；也最能考验政治当权者们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动能力，尤其是考验他们能否冒政治伦理之善恶“大讳”的胆量和勇气。在他看来，政治当权者当然不可能超脱道德伦理的价值评价，但过多地拘泥于道德伦理的条条框框，迁就甚至完全服膺道德伦

理的规范要求，政治当权者必定无所作为，浪费权力资源，最终必定会丧失手中的权力。因为权力及其充量化的强力运用不仅必然会冲撞道德伦理的底线，而且在很多时候在很多情形下，权力者摄取、掌握、运用和扩张手中的权力本身就是以超越道德伦理的既定约束为前提条件的，仿佛不下道德伦理的地狱就无法升入政治权力的天堂（高峰乃至顶峰）。这就是说，政治权力行动与道德伦理约束，简言之政治与道德之间原本就是且只可能是此消彼长，甚或有我无你、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在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权术学中，政治与道德的共存共荣毫无可能，政治家和当权者必须做出两者择一的抉择：要么遵循权力的政治逻辑，卸脱道德伦理的负担，成就自我的政治抱负；要么遵循道义的伦理规范，放弃政治权力的野心，甘于退出政治权力的角斗场而成就平凡者的所谓美德。

问题的要害在于，马基雅维里眼中的政治逻辑几乎全等于商业社会的市场逻辑和资本逻辑：政坛如同市场，权力有如资本，在政治的市场上，所有参与政治行动游戏的人们只能也只应遵循权力竞力的规则，如同参与市场经济游戏的商人只遵守资本竞争的市场规则一样。权力的竞力是政治野心、阴谋、机会或运气、力量、意志的竞力，也就是权威、权术、权能和政治命运的角逐。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寇”就一直是政治权力角斗场永恒不变的铁律，无人可以超出其外。换句话说，在马基雅维里这里，权力野心、当权无情、铁的手腕和必要的政治阴谋诡计等被人类社会视为非道德和反道德的东西都是绝对必要的，因而自有其政治正确性和必要性，但不必考量它们的道德正当性。结论是：政治的成功和优胜不得不以牺牲道德伦理为代价，权力者的权力之手不得不沾染道德伦理的污点，一如征战沙场的将军手中挥动的长剑不得不沾满血迹和血气一样。这就是马基雅维里所暗示的“政治脏手”的基本含义。

马基雅维里是坦诚而直接的，没有任何掩饰，似乎也不想掩饰什么。“政治脏手”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此政治家和当权者无法逾越严酷的政治现实条件和权力目的，无法因为道德的顾虑而减弱或降低政治目的和权力追求。万一道德伦理恰好有助于政治权术的实现及其效用扩张，那么，政治家和当权者自然也不会拒绝任何有用的道德伦理资源；反之，即便道

德伦理有着皇冠和袈裟般的荣耀，只要它们无助于权力政治事功的繁荣发展，也只能弃如敝屣，甚至不得不将之作为政治和权力游戏的祭品。显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权术学无所禁忌，道德伦理成了托起政治权力风帆的风浪，甚至是权力铁骑脚下的尸体和鲜血。

可是，即便是马基雅维里自己不在乎道德伦理，难道所有的政治人和当权者都能像他那样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地把政治之手弄脏么？政治家果真能够无视政治伦理、特别是政治家的职业道德么？无论如何，政治家和当权者对于自己的身后骂名还是难以做到若无其事的。再退一步说，即令是政治家和当权者本人可以如此，也不能全然不顾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毕竟，政治家和当权者同其他人并无根本的不同，都不得受制于人类的社会关系约束，不得不承受道德伦理和历史文化的价值裁量。中国历史上那些权贵、弄臣乃至帝王其实大多深谙此道，他们的后人更是深有体会。只不过在那情那景中，魅力远胜于黄赌毒的权力游戏让他们实在是一时间身不由己，欲罢不能。

金盆洗手不易，把弄脏了的政治脏手洗干净更是难上加难。也许，正由于此，古今中外弄脏了手的政治家和权力者中极少有人能够洗心革面，即便有，能够真心写出《忏悔录》的也一定大大少于他们以外的人群。诚然，这么说很可能有些武断，也需要用事实来具体证明。但我的意思是说，政治家和当权者们的道德之恶同样也是常人所不能比拟的。凡者作恶一般不会惊天动地，可政治家和当权者——尤其是那些权倾一时的当权者——如果作恶，则很可能会导致周天寒彻、血流成河的大悲剧，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政治之恶与道德伦理之恶或平常之恶的重大差别所在。是故，人们通常都坚信，“官德”的重要性远甚于“民德”。

由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脏手”，政治家和当权者们不能不思考他们身后的“功”与“名”问题，而普通人也不能不替他们考虑一下他们的政治身份和道德两难甚至多难的问题。政治家的志向总是非同凡响的，志在当代、功在千秋是每一个政治家和当权者都会梦想的政治归宿。可事实上，参与政治权力游戏如同玩过山车和赌博游戏一般，惊险而刺激之极：上下沉浮，悲喜交加，或者彪炳千秋，永垂青史；或者千夫所指，遗臭万年。所以，政

治游戏不仅需要一般的志向和勇气，还需要超凡的野心和坚韧。平实而论，也真是难为政治家和当权者们了，做政治生活世界里的风流人物，还真得有十二分的冒险精神不可，因为政治游戏的的确确是人类生活中一项最具风险和代价的游戏，这或许也是人们常常情不自禁地向往政治权力游戏并对政治家和当权者敬畏三分的社会心理缘由罢？！

四 一阴一阳谓之道

好啦，有关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权术学故事差不多叙述完毕，按常理该说说我这个蹩脚的讲故事者的个人意见了。我必须首先申言，我所讲的故事多半是我读过谢惠媛博士的新作之后根据我自己的粗略印象和想象性演绎来架构的，其间多半属于我个人的主观演绎，这显然是受到了时下电视台各式大讲堂风格的影响，不求本真，但求“眼球”。停指一笑，无莞尔，有苦衷。嘿嘿！

其实，我对政治与道德这对仿佛冤家的复杂关系谈不出什么意见，有的只是同普通人一样的疑问。我想，把一些个人的疑问当作公共问题提出来或许有些冒昧，可任何有关政治的疑问无论如何也还是有些公共意义的，能够提出有公共意义的问题多少也会得到人们的理解。记得马克思在评价康德的哲学时说过，康德对哲学的贡献与其说是他解决了一些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他提出了一些有意味的哲学问题。看来，能够提出真问题也不简单。

我的直觉是，谢惠媛博士的总体判断是有根据的，马基雅维里奋力而为的是把政治的归于政治，把道德的归于道德，以此尽可能减少直至完全防止道德伦理对政治事务的纠缠干扰。但他并没有以此否认政治与道德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否则，他不会如此在意道德伦理，或者说在意政治的道德伦理负担，不会大谈所谓“政治脏手”的问题——很明显，如果政治与道德伦理之间真的能够楚汉两界，泾渭分明，无论政治家和当权者如何玩弄权力权术，都不会产生什么“政治脏手”问题。政治家的手之所以会脏，皆因政治生活世界中总是时时刻刻到处都有道德伦理的幽灵，阴谋不断，

阳魂不散。于是，我们需要在马基雅维里的解读中体悟和探讨的，不是政治与道德究竟有无干系，而是有怎样的干系，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和纠结。

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注意和思考，在此提出并稍作阐释，以供本书作者和读者参考裁夺。

第一，权力与权利究竟何者优先？权力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但权利则不然，它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且更根本的是一个道德伦理的概念。将两者相提并论且作先后轻重的次序比较，本身便是在政治与道德之间讨说法，论道理。强调使政治摆脱道德伦理的干扰是马基雅维里的主要意图之一，因为这一主张，他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被看作西方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分界标志，从而使他本人成了近代新共和主义——与古希腊柏拉图相对——的先驱，甚至是西方现代性政治的思想先驱。可是，马基雅维里的用意恰恰表明，在他的时代和他所在的意大利佛罗伦萨（记住：那是一个既产生了大批近代意大利名商富贾，又代表文艺复兴时代孕育了许多艺术天才的城市），政治与道德有着多么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因为道德的存在，所以才需要他——或者，他觉得他需要向当权者和政治人民——拒绝或超脱道德，让政治权力游戏免于道德伦理的干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接受马基雅维里的主张，让道德完全摆脱道德伦理的“羁绊”，那么，政治及其权力游戏又该如何实现权力自身的系统均衡？显然，没有哪一个社会和政治共同体能够接受某种不受约束的权力统治。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从而最终必将消解权力本身。既然还是一种游戏，就必须有游戏规则。政治权力属于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Levitan），因而必须受到制约。

马基雅维里似乎没有解决权力的游戏规则和政治制约问题，他的言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权力游戏无异于市场的资本游戏，自然竞争创造自然秩序。可是，政治毕竟不是经济——除非我们给两者以某种特殊的修辞修饰，政坛也不等于市场——尽管我们承认政坛上的权力竞力与市场上的资本竞争有着相似的逻辑。17世纪的洛克和18世纪的孟德斯鸠看到了这一点，也承认政治（权力）乃是人类社会“必要的恶”。因此，他们先后提

出了分权而治的主张。分权而治的实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以恶制恶”。这一政治观念确乎被近代欧美社会所普遍接受，看起来也相当有效。但是，这一政治观念仍然难以彻底解除人们对权力制衡之合法有效的担忧：仅仅依靠政治内部的权力制衡能否持久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或政治腐败？当分治的权力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形成权力合谋，又该如何防止权力滥用或政治腐败？这仍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事实上，在现代西方政治实践中，已然多次出现了权力合谋和权力腐败的问题。所以，现代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所探讨的主题虽然并没有全然超出“公共权力及其合法运用”的主题，但具体的理论解释和分析论证却已大为改变。一个较具共识的现代民主政治观念是：权力不仅需要权力系统内部的政治制约，还需要权力系统外部的社会制约，包括道德伦理的政治自律和公民社会的外在他律。这就是说，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不仅需要“以权力制约权力”，同时还需要（甚至更需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政治良知制约权力者的灵魂。“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基础是“公民权利（the civil rights）优于且先于政治权力（the political power）”，这是基于人权优先的道德原则而确立起来的、真正具有人民民主政治意义的基本政治原则，它是政治的，也是道德伦理的，确切地说是政治伦理的。哲学地说，如果说“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命题仅仅是基于单纯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那么，“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命题则是一个强政治伦理命题，其所强调的是人民（公民）的基本权利优先于政治权力，强调以公民权利——通过日益强健的公民社会——制约政治权力，乃是一种更为合理正当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很明显，权力理论拒绝政治的道德承担，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则坚持政治的道德承诺。这是我在2005—2006年赴哈佛大学做富布莱特项目所研究的课题和最终结论，恰好可以部分地作为我对政治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理解。

第二，政治的恶——更准确地说，政治的道德之恶——究竟是一种必然的恶还是一种“必要的恶”？如果政治的恶是必然的，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就真的只有等待宗教的天国救赎了；如果政治的恶只是“必要的”，那么人们必定会追问：在何种条件、何种情形下，我们可以承认政治是人类

社会的一种“必要的恶”呢？既是“必要的”，就得有形成或产生“必要”的前提和条件，否则，“必要”就会成为“必然”！倘若如此，人类社会就会真的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了。我想，即使马基雅维里本人也不会乐见这样的后果。

不错，政治是人类进入社会文明所必须承受的代价，但这代价必须是人类自身可以承受得起的。谁胆敢打开潘多拉魔盒，谁就必须先拥有控制魔鬼的宝剑。人类之所以创造社会，志愿以社会的方式生存发展，首先是出于寻求“安宁”和“福宁”的目的，这是人类始祖们通过诸如“围猎”、“群祭”等集体行动的经验逐渐意识到的。因为组织氏族部落，继而创建城邦、国家，组成社会，逐步走进社会文明的人类需要组建诸如政府一类的公共权力组织或机构，来治理自身所创造的社会和社会生活，这就是政治的起源。可见，政治的起源是“人为的”，是人类有自觉意识和自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管理行为，既如此，政治本身就不可能是一种必然的恶，而最多也只能是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必要的恶”——如果说我们接受社会契约论的有关解释并正视政治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客观事实的话。

政治之为“必要的恶”是它必须受到制约的政治原因，但却是基于道德伦理所产生的一种政治伦理判断。如果仅仅限于政治本身，所谓“必要的恶”就是一种无稽之谈。说政治是一种“必要的恶”，是说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行使都在某种特定的程度上是以出让、限制乃至牺牲部分公民个体的人权和自由为其前提代价的。公共权力的形成是以全体社会成员让渡部分私人权利为前提和基础的，而公共权力一旦形成，私人权利的让渡就如“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公权或者政治权力就会行使其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私权的合法限制。然而，这一意义上的“恶”意仅仅具有纯前提预设的意义，而在实质意义上，公共政治权力及其运用反而应该是有益于公共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福宁与福利的——当且仅当它的行使始终不渝政治的合法正当性原则。

如此看来，关于政治之恶，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对其“恶”意的理论探究，而在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实践如何始终确保其政治合法和政治正当。如果能够确保政治权力及其运用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正当性，就可以把政治

的“必要的恶”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防止其发生；反之亦然。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合法性属于政治法律的范畴，而政治正当性则属于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的范畴；前者关乎政治原则，后者关乎政治大“道”，即所谓原则的原则。大“道”不正，政治实践的“术”与“势”必定不正，政治之恶便势所必然；大“道”正直，则政治实践的“术”与“势”也当无大谬。诚然，在现代社会结构日趋公共化、制度化和管理技术化的情况下，政治的“术”与“势”也大有讲究，所以，“社会管理”或“公共管理”才会日益凸显，成为当代社会的重大课题，公共（行政）管理学也随之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显学”。

第三也是最后最重要的问题是，让我们再一次地重复康德的问题：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究竟是“道德的政治家”还是“政治的道德家”？权力是政治的显形，最容易夺人眼球。但实际上最关键、最复杂的问题却在权力这一巨大影像的背后，在于权力这架力量强劲的机器的运行过程之中。西方近代以降的多数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似乎已经习惯于把政治看作权力游戏，就像西方的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多习惯于把现代经济问题看成纯粹的资本游戏或者市场游戏一样。但另一些人——他们的群体似乎越来越大——则不以为然，从康德、马克思到施特劳斯，甚至包括部分的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以及詹姆逊、丹尼尔·贝尔等等，都不同程度地看到了权力的背后和权力运行过程之中的那些更深刻的东西，比如，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和政治家的道德；以及“文化政治”；等等。这其中，权力好像仍然是焦点，但却不再只是形式或抽象的权力概念，而是同权力者本身及其所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历史的特殊语境密切关联的活生生的权力行动。在此情形下，政治的焦点与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作为权力主体的权力者及其身后与内心。

我赞同这种新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理念，并不遗余力地为之辩护，努力开拓其言路和理路。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光谈论权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尽管不能不谈。权力是死的，只有权力的形成、把握、运用和制约才是活生生的。纠缠死的东西当然有史学的价值，也可以间接地启迪现实，但毕竟研究活的东西才能更直接深入我们实在生活的堂奥，一